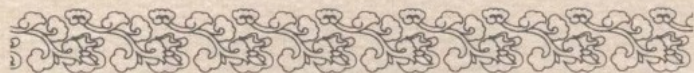


材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社 会 建 设 丛 书



第一辑

社会地位与阶层意识的定量研究

——以上海地区的阶层分化为例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境外公共政策扫描

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

——以美、德、日三国为例

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

友好社会的寻求

——美、日、法三国构建社会协调机制研究

上架建议：社会学

ISBN 978-7-208-07435-4



9 787208 074354 >

定价：13.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社会认同： 一种结构视野的 分析

C912

L5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以美、德、日三国为例/李友梅,肖瑛,黄晓春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社会建设丛书/李友梅主编)

ISBN 978-7-208-07435-4

I. 社... II. ①李...②肖...③黄... III. 社会结构-研究 IV. C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5061 号

责任编辑 田 青

特约编辑 毛 茅

美术编辑 路 静

社会建设丛书/李友梅主编

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

——以美、德、日三国为例

李友梅 肖 瑛 黄晓春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www.ewen.cc 格致出版社
www.hibooks.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109,000
版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435-4/C·303
定价 13.00 元

PDG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阶段性成果

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市重点学科“都市社会研究”建设项目 (Y0104)

上海大学《社会建设丛书》编委会

主编 李友梅

编委会成员(按照姓氏拼音)

邓伟志 李友梅 刘玉照

仇立平 肖 瑛 张文宏

张钟汝



目 录

引 言

001

一、认同与社会认同

002

二、社会认同的力量

010

三、社会认同的支撑体系

015

四、支撑体系功能匹配的理想形态

027

五、并非多余的话

030

第一章 多元社会认同:以美国为例

035

第一节 稳定性与灵活性:美国的社会认同协调

035

一、美国社会认同的三个基础性领域

036

二、社会组织方式主导的社会认同协调

050

第二节 多元主义与多中心秩序:社会认同协调的基础

054

一、多元主义:美国的社会运作模式

055

二、多中心秩序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

058

三、多元主义与多中心秩序:美国社会认同协调的基础

064

本章回顾与小结

067

第二章 “国家与社会的嵌合”:德国社会认同建构的独特模式

070

第一节 德国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

071

071	一、德国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之基本状况
089	二、德国社会认同基础性领域相互协调的关系
095	第二节 德国社会认同的独特历史条件
095	一、合作主义传统：德意志的社会运作模式
105	二、“权威秩序观”：德意志社会运作的深层思想
112	三、合作与权威秩序：德国社会认同基础性领域协调之可能性
116	本章回顾与小结
122	第三章 从发展取向到均衡政治：战后日本社会认同的基础重构
123	第一节 以经济绩效为基础：战后 30 年日本社会认同建构之路
124	一、日本独特性与“优越”文化
130	二、忧患感与群体意识
133	三、战后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社会认同构建之路
140	第二节 转型：均衡政治与认同重构
141	一、遭遇“泡沫经济”与社会认同三大基础领域的结构性变化
149	二、认同重构与多元政治
153	本章回顾与小结

157

第四章 当代中国社会的认同再结构

157

一、 社会认同在当代中国

162

二、 已有的治理尝试与可能的革新之路

167

三、 新的集体合作与社会自我调适

173

后记

引言

近数十年来，在各种学术文本中，“认同”（identity）是一个出镜率相当高的概念，指一种被赋予具有军事、暴力等“硬权力”（hard power）所无法企及的独特和具有非凡能量的“软权力”（soft power）（奈，2005）形态。研究“认同”，探索具体社会背景下社会认同建构的有效路径，已成为学术界一个长盛不衰的重要论题。

“认同”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兴起，与20世纪80年代前后世界学术话语的后现代转向有着密切关联。在这个转向中，一些平素不为人所注意的、高度文学化的概念——如“修辞”（rhetoric）、“诠释”（interpret）、“建构”（construction）、“想像”（imagination）、“符号/象征”（symbol）——凸显出来，并很快发展成为一种高调的声音。这种声音进入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催生出的成果之一就是从建构主义角度对“社会何以可能”^①这一

^① 这里所谓的“社会”，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社会”是同义（转下页）

问题的回答，即“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理论。正如很多后现代主义学者所宣称的那样，“修辞（rhetoric）^①并不是罩在真实的深层结构外面的一层外罩，并不是‘简单的隐喻’。它实实在在就是那真实存在本身”（伯克维奇，2006:12），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认同”同样是一股非常强大甚至神奇的力量。它虽然是想像的，却可以建构出实在来。不同的认同生产出不同的社会（卡斯特，2003a:ch. 1），成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安德森，2005；亨廷顿，2005）以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冲突的重要根源（亨廷顿，2002），并构成个人本体性安全的基础（Giddens，1991）。本书作为社会认同研究的文本，将以探讨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其支持体系，为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的社会认同基础的构建提供经验借鉴为基本目的。

一、认同与社会认同

认同是一个“求同”和“存异”同时发生的过程。按照其在英语中的对应词 identity 的语义，“认同”有两个相互对立的意思：1. 同一性，即“自我归类”（self-categorization），与他者共有的素质或者状况；2. 个性，即作为一个

（接上页）的，指涉的是一个具有确定的时空边界的人类生活的综合体，如中国、上海这些名称都界定特定社会的时空边界和总体特征。

① 原文翻译为“言说”，遵照学界惯用译法，笔者在引用时将之改为“修辞”。

长期存在的实体的个人所具有的不同于他人的鲜明的个性。如何来看待一个概念同时出现的这样两种相互冲突和矛盾的内涵？答案也许是回到社会中，只有在社会关系背景下，我们才能解释它们之间看似矛盾实则协调的关系。我们身处或者面对的“社会”是以复数形式（societies）出现的。无论是认“同”还是求“异”，都必须参照特定的社会边界来确定。在特定的社会边界内部，“认同”表示的是“同”；超出这个边界，“认同”实质上就变成了“求异”，即彰显“个性”。由于只要社会存在边界，就必然出现内外、我他的分别，因此，认“同”与求“异”实质上就构成了“认同”这一硬币的两面。甚至，求“异”还是认“同”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在社会心理学中，这种“求异”通常以建构“偏见”（bias）的方式得以实现（Brown，2000），并且带有强烈的我族中心主义色彩。所以亨廷顿（2005）认为，为了建立关于“我们”的“认同”，必须寻找对立面，即建构“敌人”，从对“敌人”的想像中寻求我们自身的形象。总之，所有的认同都是建立在对我和他、我的社会和他的社会的区分的基础上的。但是，正如“差序格局”（费孝通，1998）所彰明的那样，由于区分“我”和“他”、“我的社会”和“他的社会”的边界总是变动的、多元的，参照系的变化就会生产出多种多样的认同来，小到具体的个人对自身身份的界定，大到一个民族国家对自身特征的寻求。譬如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同一性”是与作为“中国人”这个人群的集合相对应的。“中国人”这个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和

国民性格，构成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在基本的国民性格方面，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是共同拥有的。但是，相对于“美国人”而言，对“中国人”的认同恰恰突出了“中国人”的个性和特点。对于一个具体的“80后”的中国人而言，一方面他是社会的，作为“中国人”时，他具有“中国人”的基本的素质和状况，作为“80后”时，他分享“80后”的基本心理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用齐美尔（Simmel, 1971）的话说，他又拥有某些并非他所处社会其他成员所共同拥有的特征，从而使自身区别于所属社会中的其他个体。

认同强调的是个人或者群体的自我建构，即强调认同承载者的主体性。泰勒（2001:48）指出，“自我部分地是由其自我解释构成的”。卡斯特（2003a:2—3）在解释“认同”时说，“关于认同，当它指涉的是社会行动者之时，我认为它是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角色是由社会的组织与制度所架构的规范来界定……。认同则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也是由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无独有偶，亨廷顿（2005:20—21）在界定“认同”时，也类似地说，“identity 的意识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 都是构建^①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或自

① 根据本书的理解，这里被译的“构建”应该是“建构”（construct）。但因找不到英文原文，我们无法作出确认。

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 identity 的”。从上述引文不难看出，“认同”不同于简单的意识形态灌输或者角色安排，个人或者群体在“认同”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动性和建构权力，能够对各种外在因素作出适当的“诠释”（interpret），作出接受（即内化）或拒绝的选择，它是行动者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能力和行动的反身性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 of action）能力提升的结果和表征（吉登斯，1998）。在全球化和风险社会背景下，“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成为社会认同的一个核心概念，意味着个人在认同选择和建构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Beck，1992），个人必须不断地根据新信息和新知识对自身的发展作出“反身性筹划”（reflexive project）（Giddens，1991）。

“认同”所内含的行动者的主体性维度使它同下文要论述的、作为认同的支撑体系之一的社会意义体系这种外在于个人的结构性因素区别开来。

当然，强调“认同者”的能动性并不等于人们在“认同”的选择和建构方面是完全自由的。正如吉登斯（1998）把人的意识划分为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和无意识三个层次一样，“认同”的自由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多数的人而言往往是隐性的，并且受着特定的基础秩序的约束，在个人身上常常表现为“不得不如此”的样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下文还要讨论促成和强化认同的基础性因素。

另外，认同的主体性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意义上的，是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过程中建构的。这也许

是泰勒(2001)把语言引入对认同的解释中的根本原因。把认同界定为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建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指不同个体在互动过程中形塑出一种崭新的社会身份认同。譬如美国作家塞林格(Salinger, J. D.)在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设计了一个不“认同”美国主流文化的苦闷、颓废的青少年霍尔顿的形象。在小说的传播过程中，“霍尔顿”这种在美国文化中本来不存在或者非常个别化的现象逐渐演变成美国青少年读者的一个共同的“符号”，不经意地形塑出一种“霍尔顿文化认同”。这种新的文化认同类型，就是青少年读者在阅读、诠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交流读后心得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当时成功地扮演了美国青少年间接或者直接互动的媒介的角色；另一指外来的、试图融入某一既存群体或文化之中的人们同这些群体或者文化占有者之间的互动。譬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出现了一批通过体制外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但他们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他们努力跻身主流社会或者中上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却是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拒斥，将他们纳入“暴发户”等明显带有污名化色彩的群体中。由此可见，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些靠体制外手段先富起来的人群与体制内人群之间的互动均为失败的，其争取主流社会的认同的努力没有产生明显的成就。

“认同”可以拥有不同的定语，形成多种形态的“认同”。就个人而言，认同同时表现为两种面相，即“自我

认同”(self-identity)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前者指涉“存异”，即“自我证明”(self-verification)和“自我预期”(self-efficacy)；后者指涉“求同”，即“去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 (Stets & Burke, 1998)。譬如一个人努力引领时尚，就属“自我认同”；追逐时尚，则是“社会认同”。二者矛盾性地纠缠在一起，构成个人“认同”的一体两面。在人类社会，类似于感叹“世人皆醉，惟我独醒”这样的只求“自我认同”而拒斥“社会认同”的现象从比例上看是非常小的。当然，正如泰勒(2001:48, 50)所说，“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而“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或者“在与某些人的对话关系中，我才是自我”。任何认同，包括自我认同，本质上属于社会认同，都是以特定社会中的人或者社会群体为参照而展开的。

对于个人和群体而言，自我归类的对象不同，其内容自然会出现各种差别。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性别认同”、“组织认同”、“阶层认同”、“职业认同”，实质上都是“社会认同”，是对某一具体的社会形态的认同，是对自己“归属于何种社会范畴或者组织”(Stets & Burke, 1998)的思考。正如前面所举的“80后”的例子，一个生活在具体社会中的人，总是同时有多种社会认同并存。就如一个大学教师，既有对所属单位的认同，也有对所属学科或专业的认同，同时还必须有对所属教师职业的认同。

由于“认同”是行动者对认同对象于自身的意义和价

值的诠释和建构过程，本质上是精神的和文化的，所以，“社会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特定社会类型的文化基质的认同，故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就如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强调的那样，没有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核心地位的认同，就没有美国的民族认同。但是，这种说法不一定具有普世性。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之间在主观上存在紧张关系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就如鲁迅那一代的新文化健将，一方面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民族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排斥，竭尽全力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对国人的思维束缚。但颇为悖论的是，这种对本国文化的拒斥和反对恰恰是建立在对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深层认同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是为了更好地认同这个民族和国家。

在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代背景下，社会认同正在成为一个问题。在传统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基本是固定的，参与社会交往的人基本上是确定的，自己担任的社会角色甚至是先赋性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认同非常简单，不需要个人发挥太多的知识和主体性，顶多是在遭遇“忠孝难以两全”时多费些踌躇罢了。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通过现代通讯和交通技术不断变换空间概念、时间概念和文化概念，确定的空间边界和交往网络开始消失，职业日益弹性化，甚至民族国家这样最为确定的社会组织也在发生变化，其物理边界不断被超越，其文化内涵不断被抽空、填充和再生产。一言以蔽之，我们正逐步进

人鲍曼 (Bauman, Z.) 所谓的“流动的现代性”中, 即一个全面相对化、没有确定性和固定的港湾、随风漂移、各种风险日益增多且防不胜防的生活情境中。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流动性和相对化从根本上抽空了社会认同所必须依赖的确定的参照群体。于是, “怎样获得社会认同”的问题就被置换为“社会认同何以可能”的问题。

同样颇为悖谬的是, 确定性的消失不但没有让人类放弃对确定性的需求, 反而进一步促使人们认识到确定性的重要性。于是, 在没有确定性的条件下追求确定性就被提升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社会认同”也是如此, 正是它的快要消逝才让人们陡然觉察到其重要性, 正是它的不可能性使得它的必要性得以凸显。正如下文将要论述的那样, 学术界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是: “社会认同何以可能”的问题不仅关涉现代和后现代条件下个人的“本体性安全” (ontological security) 和“本体性焦虑” (ontological anxiety), 同时还关涉全球化条件下具体的社会或者组织如何实现自身的再团结以提升自身在各种新的社会竞争场域中的驾驭能力。更为鲜明地说, “社会认同”已经成为挽救全球化冲击下濒于崩溃的各种确定的“组织”和“文化类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而这两种相互依赖的不确定性如何实现彼此的“救赎”就显得更为根本了。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社会认同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 但本书论述的焦点集中在民族-国家认同上, 集中在个体如何实现对确定民族-国家的认同, 更为精确地说, 即民族-国家如何推动个体对自身的认同。在当今中国, 民族-国